

# 身处基层对年轻人是一种历练

“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观察④

本报记者 李斌

政府的多个部门“盯”上了资教生,其中包括县纪委和监察局。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已成为湖北县乡政府部门补充公务员的重要来源。

几年前,“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到农村任教的大学毕业生,既是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推动者,也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新的生活方式的实践者。“经过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社会变革的洗礼,在他们中间,必将涌现出一大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

## 18名资教生成为郧西县的副科级干部

“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发出的号召。这个号召表明那些地方既重要又缺乏吸引力,事实上,许多高校毕业生宁愿在城市失业,也不愿去农村工作,造成国家人力资源的浪费。

人尽其才会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实现它的前提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但湖北作家刘醒龙提醒说,在城乡间的巨大反差下,一个农家子弟最大的愿望也许就是走出乡村,而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能留在城市几乎成了读书的全部意义。“这导致乡村的失业症状越来越严重,成为青春的贫瘠之地”。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人才的引进可能比招商引资还要艰难。因此,在那些地方的领导看来,“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是“雪中送炭”的行为。

郧西县把这项计划看做是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的重要契机。该县主要领导认为,要改变郧西落后的经济面貌,必须借此机会大力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不久前,县委书记明确要引进多少名,今年至少要引进100名资教生。易是郧西县的教育局长,“我们是在为今后郧西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人才,积蓄力量。”当地每年有不少学生考入大学,但毕业后很少有人愿意回来,“这让县领导很头疼。”易文斌说,“资教生是重要的人才来源,我们迫切需要他们”。

“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面向所有的本科院校,几乎能包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的毕业生。一些资

教生脱颖而出,成为政府部门青睐的对象,有人还在教书的同时就兼任乡镇团委书记或妇联干部的职务。

“很多部门都盯着我们的资教生。”易文斌得意地笑了。目前,郧西县有50多名资教生在县委机关、物价局、环保监察等部门挂职。对此教育局长显得很大度:“我们要树立大的人才观,资教生来到郧西,我们不会只把他们限制在学校。”

在过去的7年里,郧西县相继录用了490多名资教生,有些人在服务期满后离开,但留下来的是大多数。其中一大批人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有30多名资教生被列为教育后备干部培养,另有32人正式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其中18人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了副镇长、镇党委副书记和副局长等职务。

在黄冈市阳新县,有20名资教老师考取公务员,其中8人担任乡镇主要领导职务。阳新县委组织部部长闵永良对这支新近涌现的人才队伍感到欣喜,他说:“他们在农村任教后,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成了公务员队伍中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后备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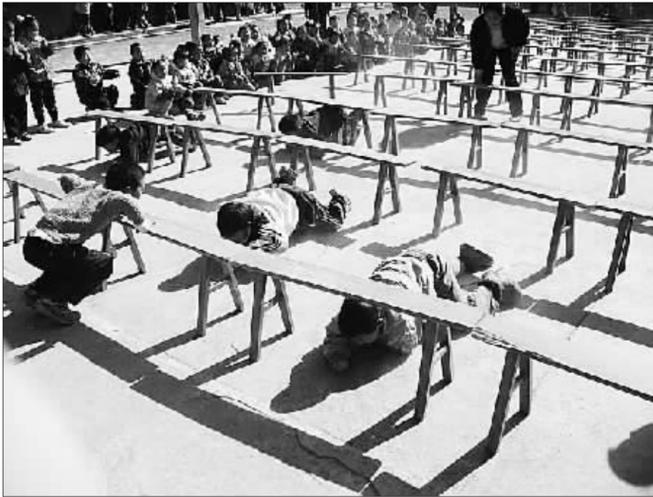
湖北省要求乡镇干部中必须有两名35岁以下的成员,其中一位应小于30岁,闵部长说:“这基本上只能从资教生中选。”他认为,再经历几年的磨练和锤炼,资教生中就会有有人担任乡镇正职,成为县级领导的候选。

“他们不参加资教,就没有这个舞台。”闵永良感慨,“这个渠道对我们用干部、储备干部很有好处,已经形成良性循环。也能让那些对从政有兴趣的资教生看到发展的希望。如果这个渠道不畅通,他们走了,对我们双方都是损失。”

## 三年经历 终身财富

史隆生现任郧西县人事局副局长,他认为自己当初在面试环节能够自如回答问题,直接得益于教书的经历。“教书与做官是相通的,虽然面对的群体不一样,但都需要管理,都需要超强的耐心和韧劲。”他说。

唐利凭借在资教期间的出色表现和不断进步,服务期满后成了一名县教育局副局长。2007年,他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毕业,来到红安县的店子中学资教。像许多资教生那样,她承担了较重的教学任务,此外,3年中,她参加了十几次培训,“没有虚度业余时光”,阅读了大量书籍。她撰写的有关论文先后获得全国一等奖和二等奖。她辅导的学生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望坪希望小学举办的第一届趣味运动会,图为学生在参加“钻板凳”游戏。图片由该校资教教师罗融华提供

中有15人获得省级作文竞赛大奖。

服务期满后,她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一、票决第一的成绩被任命为红安县教育局副局长。“人们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常想,资教的这3年,我帮助了乡村孩子,也成就了我自己。”唐利说。

这些初为公务员的年轻人正是资教生活的受益者。他们有了宝贵的最基层的经历,在几年的艰苦生活中已被锤炼得更加成熟,具备了更坚强的意志力。

资教生叶森如今是大冶市委党校副校长,他说:“在农村能耐住寂寞,守住清贫,以后的很多困难都能挺住。”一位考取了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生的资教生也认为这种生活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勇气。“每当遇到困难,我总会想起资教,想起那些贫困家庭的学生,这时,我就会重拾信心。”

在条件简陋的乡村学校至少任教3年,年收入仅两万元,这对资教生的生理和心理都是一次挑战。不能适应者迟早会选择离开,或在郁郁不乐中结束他们的资教生活。

但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像清水县马岭中学的朱海霞那样在埋怨、失落中调整自己的情绪,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满足感,从而拥有不会轻易为外界所动摇的强大内心。郧西县一位现任镇党委副书记的资教生说:“经过这样一段磨砺,人

会变得愈加成熟,更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感。”

朱海霞资教的第一个学期是在抱怨中度过的,她当时的心情就像最初居住的潮湿、充斥着霉味的地下室那样黯淡。“晚上,四周一片漆黑;早上一睁眼,看到的只有学校的小天地。”这名性格活泼开朗的大学毕业生,有时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我自身条件不差,干嘛要来这儿吃苦?这里的孩子值得我付出吗?”

过年回家,作为家族里“学历最高,收入最低的人”,她总是成为亲友用来和同龄人比较的对象。“嫁到哪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收入多少?”这些问题都曾带给她很大的压力。

两年之后,她已经可以从容告诉别人:“我在资教,工资不高,但很快乐。”她明白:只要真正热爱这个事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条件艰苦都不是大问题。“生活苦一点,可以慢慢改善,一个破房子也能装饰得比较温馨。”“身处最底层,对年轻人确实是一种历练”。

“3年经历,终身财富”,这是“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提炼出的一句口号,也表明了该计划对于年轻人成长的意义。县教育局原局长张晓冰认为,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基层的经历,如同一口深井,将为他们今后的人生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 资教生是“及时雨”和“营养剂”

在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陈安丽的眼里,资教老师“为了一批批的孩子,作出了奉献,也有很多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成熟了,能更多地考虑别人、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他们是知识分子和基层社会结合得非常好的样本,是一群有理想、有智慧、有抱负、有作为的人。”陈安丽说,“我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

众多的资教生在服务期满后选择留在农村学校,这让陈安丽感到欣慰,“基层选择了他们,他们和基层融为一体。”许多资教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利用所学知识为农村社会服务,改变了一些人“读书无用论”的想法。

一名从华中师范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的资教生,被借调到郧西县物价局,负责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她几乎跑遍了全县各个乡镇,把农民们种植农产品的生产流程制作成表格,帮助他们分析,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成本,为农民们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公安县郑公中学的41名资教生,被安民群众誉为“智囊团”。他们指导当地农民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还为全镇免费维修电脑。

在麻城市黄土岗镇中学资教的张林,是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他走访了300多户学生家庭,对一些农民家庭的饮食用水、生活起居等提出卫生建议,向贫困农户赠送红心蛋、风湿止痛膏等常备药品。他还多次被邀请到镇卫生院讲授中医理论,协助镇政府在全镇开展菊花种植工作。

蕲春县白水村修建的小广场很快就要完工,白水中学的资教生张雯将成为村民的免费“舞蹈老师”。张雯还曾与同事们一起,走进了学校周边的11个村庄,把募集到的数千件衣服、送到学生、敬老院的老人和贫困的村民手中。

资教生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改变了许多人对他们的看法。蕲春县张榜镇的一位村民后来明白了:这些大学毕业生来农村,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农村服务。甚至,一些习惯用收入衡量工作优劣的农村家长也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也去资教。

郧西县教育局在一篇文章中盛赞资教生如同“及时雨”和“营养剂”,注入干渴而贫瘠的农村大地。文中说:“这项计划给予了乡村因青年外出打工而久违了的青春冲动,它将最需要人才的乡村与富有知识的大学生直接撮合到一起,是一场了不起的、充满爱心和远见的才配置行动。”

## 中国科协:近年重大科技突破均源自学科交叉融合

本报讯(记者邱晨辉 实习生李林)在近日举行的2012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静海发布了2011-2012年度学科发展报告,介绍中国空间科学等23个学科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并指出学科与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此次发布的23个学科的进展情况来看,许多重大科技突破均源自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例如,空间科学涉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气象学、大气科学、材料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探测获得重要科技成果、“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成功实现交会对接,则是基于涉及空间天文学、空间物理学、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科学、遥感研究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针对未来学科发展,李静海提出三点思考:一是要重视超前研究学科发展演化规律;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三是对知识体系深入分析以推进学科变革。

## 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原春琳)英特尔在亚洲最大的技术盛会——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简称IDF)日前在北京开幕。英特尔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兼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马宏升表示,半导体技术在不断发展,几乎所有的人和行业——企业、医疗、教育和整个社会都将受益于强大的微处理器、互联网连接以及用户体验上的突破。而跨越技术屏障已远远超出物理学或工程学问题范畴。

IDC的数据表明,去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PC市场,2011年的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3%,目前占全球PC需求总量的20%;IDC数据还显示,中国服务器市场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在全球数据中心市场中已位居第二。来自工信部的数据则表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拥有超过10亿用户。

马宏升说,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流量的爆发式增长……这些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

本版编辑/杨亮庆

Tel: 010-64098256

E-mail: fzhz2000@126.com

# 流泪的湿地

### 官员、学者、人大代表均呼吁加快全国性湿地立法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实习生 许文茜

“过去,这里水草和水波连成一片,到冬天还有灰鹤,真好看看。现在你看,多少地方变成了干地、沙土地、死水坑。”作为在郑州花园口镇住了一辈子的人,老韩说起昔日村民眼中的“人间仙境”,连连叹息。老韩住的地方,是一片典型的中原黄河湿地,但多年来,他眼见这片水草丰美的河滩,被烧荒种粮的、渔家乐、影视城甚至飞行俱乐部“侵蚀”,侵蚀之处,地面龟裂,水草枯槁,垃圾遍地,有的还散发着恶臭。

而这片黄河湿地的遭劫,只是全国湿地命运的一个缩影。

“目前,土地、森林、草原都有法可依,湿地成了最弱势的地块,也是被牺牲的主体,人人都想咬一口。”对此,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略显无奈地告诉记者。

湿地,这个你也许并不熟悉的概念,它的遭劫,却使所有人面临一场生态灾难。而为湿地立法一部全国性保护法,“呼吁了快10年,至今没看到尽头。”

## “地球之肾”变身渔家乐、宅基地、化工厂

几艘渔船泊在近乎干涸的水面上,不时排出油污;马匹和摩托车在板结的水畔来回奔跑,水草几乎殆尽;一旁的黄土堆积如山,推土机的痕迹依稀可见,一道据称是“保护飞行俱乐部跑道”的土堤,初具雏形……

记者看到了这一幕,发生在黄河滩南裹头,郑州的水源,中原的肾脏。这个在2009年的照片中还宛如白洋淀的地方,如今满目疮痍。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黄河中下游湿地。与鄱阳湖、滇池、诺尔盖沼泽和大小小小叫不出名字的滩涂、库塘,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一样,是中国3848万公顷湿地中的一员。

而这个数字,只占国土面积的3.7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东北、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东南滨海和云贵青藏高原,是它们的少数几处栖身之所。如今,它们正在日渐萎缩。

在郑州,记者眼见前述被蚕食的黄河湿地,动辄上百亩,而被媒体公开报道,在黄河湿地上犁地、撒肥、种庄稼,正在焦作武陟县一些地方大举进行。鹤壁国家湿地公园,3月底甚至曝冒近百家豪华别墅。

这还只是河南一省的例子。在内蒙古,运煤公路被曝将修建石人湾湿地核心区;在黑龙江,虎林珍宝岛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千亩湿地,已被毁变

耕地;哈尔滨松北区一块广阔的江滩湿地,数年前就被开辟成了一块非法采砂场;在山东胶州湾,大片海滩“变身”经济开发区,上面化工厂林立……在网上输入“湿地”字样,你会发现,对它的“强拆刚”正在全国上演。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淡水之源,是跟森林、海洋并行的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它像一台排毒机,水流过之后速度变慢,湿地中的植被和微生物,能将水里的一些重金属、有害金属附着、分解和吸收,流出清水;它又像一块海绵,调节洪涝,像四川诺尔盖,每年给黄河的补水量能占到25%。就连沼泽地的泥炭,别看不起眼,也是最好的有机肥料。”提起湿地的益处,马广仁主任滔滔不绝。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近4万公顷湿地的更直接作用,恐怕是以淡水湖等形式,维持了全国可利用淡水资源总量的96%。有科学家断言,假如湿地和森林从地球上消失,全球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

再将目光稍稍放远一点,湿地的“储碳”和“物种基因库”功能也相当“给力”。假如没有占全球陆地面积6%的湿地,来储存约7700亿吨碳和40%的已知物种,全球气候变暖和基因库枯竭将大大加速。

几年前,全国人大常委、著名农业生态专家杨邦杰就忧心忡忡地表示:“就像保护耕地一样保护湿地红线。”2010年全球召开坎昆会议时,媒体甚至用“走近2012”来报道对“湿地之失”的讨论。

然而,长达数十年的呼吁,没能有效阻止我国湿地萎缩的脚步。

经济利益驱动争啃“唐僧肉”

“东北的沼泽大部分成了耕地;长三角、珠三角的湿地一直在减少;整个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湿地在消失……”提到近年我国湿地的整体命运,郑邦杰曾这样概括。

若将这一描述转成数字,也许更为直观。虽然国家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表示,建国初期至今,我国有多少湿地“消失”还没有一个官方统计,但据媒体总结披露的数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有近半的沿海滩涂不复存在,东北三江平原约500万公顷的沼泽,已消失八成,近1000个天然湖泊消亡,仅在“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湖泊面积就锐减了2/3。

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萎缩的不仅是面积。2010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发布研究

报告指出:中国遭到破坏的湿地,破坏程度已经波及原有湿地的40%-50%。水质恶化、“藏污纳垢”,不少生物濒临灭绝……既是湿地的生态功能丧失的注脚,也是灾难的伏笔。

有的灾难已经发生。“我们有调研表明,西南五省干旱,与南方多省湿地的面积减少有关。”马广仁主任说。而公开资料显示,在甘肃、青海等半干旱地区,情况更不乐观。由于数百个湖泊沦为“消失的罗布泊”,在敦煌等地,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逼近。

是什么让湿地频频“遭劫”?“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利益驱动。”中国湿地博物馆馆长陈博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一语破的。他告诉记者,除去气候变化、降水不均等自然因素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湿地消失是一场“人为劫难”。

据陈博君介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用地矛盾也逐年尖锐。由于“人多地少”程裕着商人的财路和政府的GDP增幅,二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一片片在现行土地分类中属于“未利用地”的原生和自然湿地。围垦造田、填海造陆,成为很多地方扩大土地面积的第一选择,“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更突出。”

于是,在与发展建设相伴的各项利益博弈中,一贯被视作“荒滩”、“荒水”的“地球之肾”,首先成为保障耕地、建设用地和林地的牺牲品。

记者了解到,这场人与湿地的“抗衡”,从建国初三江平原湿地变身“北大仓”起,就已开幕。至今,由于一些地方的滩地开荒租金低廉,填湖、填海、填塘造田方兴未艾。

“湿地那么大,很难难个网”罩起来。附近村的老百姓看着眼馋,夜里悄悄开,今年开一亩,明年开一亩,慢慢地也很可观。”在黑龙江,一些基层湿地管理人员无奈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你清、他退,你走、他开,是个拉锯战。”

而马广仁主任告诉记者,老百姓的侵占只是“任瓜俩食”,更大的手笔来自企业和政府。

湖景房、海景房……近年来,遍布各城市滨水带的所谓高档住宅,在令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使大片湿地失去蓄水功能,变成硬地。

“湿地上稍微大一点的工程项目,基本都是政府推动的。”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而填海造经济开发,在其上招商建楼,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国家海洋局一项调研发现,近20

年,胶州湾湿地已因此萎缩了1/3。

“围海造田一平方米的成本只有200-300元,而土地利润很疯狂。”中国海洋大学环境学院郭佩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里面的“经济账”,这比一般征地的成本低得多。

利益驱动下,湿地自然人人垂涎。

无法可依,“弱兵”如何护“肥肉”?

其实,对“地球之肾”,我国并非不重视。

马广仁主任告诉记者,1992年,我国无附加条件地加入了“国际湿地公约”(全称为《关于特别是水禽栖息地的湿地国际公约》——记者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抢救性保护湿地”。迄今,共为此建立了41处国际重要湿地,213处国家湿地公园,大约550多个遍布省、市、县的自然保护区。

然而,即使这些保护区里的湿地,也挡不住“淘金者”的脚步。

“为啥守不住?因为守这些宝地的是‘弱兵’,还没‘武器’!”在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这样诉说“湿地之殇”的由来。

在多名受访专家看来,这名工作人员的话,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湿地保护多头管理,且无法可依。

陈博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体制,对湿地这块“唐僧肉”的管理和保护,主要归口到各级林业部门。“而农业、水利、国土资源、海洋、水务等部门,分别负责管理一块湿地里的各个资源要素。”

明眼人一望便知,在这种“弱兵带强将”的配置下,任何一个部门对湿地生态“咬一口”的冲动,林业部门恐怕都难以招架。

“别的不说,我们这边的湿地,大坝附近的百米区域归水务局管,滩区的土地所有权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它们要把地租出去开农庄、圈鱼塘,我们没辙。”问到湿地为何遭劫,这名工作人员也一肚子苦水,“哪怕你限制一下挖坑养鱼,也会影响农业部门的业绩。”

部门分工与利益纠葛,不是湿地保护的唯一拦路虎。更大的坎儿可能在于,破坏湿地之举,在相当多的省市,根本“无法可依”。

“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强调湿地立法,但目前关于湿地生态系统的法律法规,还是一部都没有。”马广仁主任告诉记者,虽然在《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有湿地保护等字样,“但是究竟怎么算湿地?怎么保护?破



黄河湿地花园口段,一些河滩已经萎缩、发臭,水面上停着渔家乐船只。本报记者 王梦婕摄

坏了怎么处罚?没有下文。”

看来,在破坏湿地有暴利又“安全”的语境下,它的“遭劫”几乎在所难免。

而在像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这样的基层站点,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他们对争啃湿地之举,能“倚仗”的仅是市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红头文件”。用工作人员的话说,“法律位阶太低,可操作性不强”。因此,除了日常巡逻,给水鸟投食,救治一些受伤的水禽,“遇到违法破坏的事儿,还得找森林警察”。

也不是没有省级人民政府为此出台条例。据马广仁主任介绍,迄今已有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吉林、西藏等11个省、自治区出台了地方性的《湿地保护条例》,但在一部全国性法律“缺位”的背景下,劣势难扳。

“对严重破坏湿地的行为,罚款收效甚微,又没有规定可以刑事处罚,就成了‘轻微破坏行为罚款了事,严重破坏行为处罚不能’。”在黑龙江挠力河自然保护区,一名叫张丰江的保护站站长曾这样描述尴尬。

无奈之下,有的地方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在湿地上栽树,以求能受《森林法》的保护。因为,《森林法》里有关于严重破坏森林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

“这种方法,有时我们也用。”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祖朝向记者苦笑说,靠通报批评、曝光罚款和请领导来制止在“地球之肾”上的“掘金”,实在力度不彰。

## 全国性湿地立法“出炉”难在哪儿?

为何近10年都出台不了一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事实上,几年前这部“条例”层级的法律,已经在推进的路上。但“湿地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立法的着眼点,更多会放在对整个湿地生态功能的保护上。而它在短期

内,与一些部门的利益并不一致。”马广仁主任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部门间的协调,是个绕不过去的题。

比部门协调更难变的,恐怕是发展理念。马广仁告诉记者,近10年来,湿地作为生态的概念才进入当政者的视野。“放着一块城中湖,你是把它填了造别墅、办企业,还是把它留给城市居民、子孙后代?恐怕当下的决策者,还是会选择前者。”

好在可喜的迹象也越来越多。据悉,近两年来,每年“两会”收到有关各地湿地立法的提案,已达几十件。马广仁也感到,今年和几个部门沟通协调的时候,“觉得比前几年难度小多了,整个社会的认识在变化,各个部门的观念也在变化。”

“其实,保护湿地跟赚钱并不矛盾,你完全可以既有效保护,又合理利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比如,一些湿地被划为保护区之后,你还是在里面捕鱼,但捕鱼的数量和季节要受限制。或者,有些湿地的某些季节可以允许放牧,但鸟类产卵的时候就不能放牧。”解炎认为,这些规定可以在满足老百姓利用自然的需要和保护湿地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国家可以像‘退耕还林’一样,给予湿地保护区内外的群众一定经济补偿,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河南籍全国人大代表李其宏这样建议。

“从根本上,怎么用湿地还是思想意识和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马广仁表示,“过去一个地方的吸引力可能依赖道路、税收、优惠政策,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新提法,‘把湿地作为地区的基础设施’。当你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身边有水鸟飞过时,不是一种幸福吗?”

马广仁希望最近2014年,这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条例能“梦想成真”。